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

朱山河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同志将当前的改革置于中国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态历程中去作宏观的历史性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科学结论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这一结论也是从目的论角度和政治方位对改革的科学分析，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的革命性质，为改革航船的胜利前进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贯串着一个中心思想——不改革不行，改革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出路所在。如何认识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改革，或者说，当前所进行的改革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意义？对此，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正确认识和领会这一英明论断，对于我们积极投身改革，保证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取得圆满成功，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不只是为我们认识当前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如何把握当前的改革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方法比结论更有意义，因为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方法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进行科学认识必不可少的工具和中介，离开方法，主体就无法与客体发生关系。方法虽然属于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与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知识水平、思维方式直接相关，但方法又不是主体可以随意创造、能方能圆、无关紧要的东西。方法并不是被动的力量，它一旦确立，就会对认知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只有当方法正确地反映了社会或自然以及思维活动的规律时，它才是正确的，才有可能把认知活动导向正确的目标。我国清代学者阮元曾经深有体会地谈到方法对于认知活动的意义，“门径苟误，跨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②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不只是为我们认识当前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教义”，而首先是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

前些年有些人对改革颇多疑虑，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就造成疑虑和抵触的原因而言，虽

各有不同,但就事论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孤立静止的认知方法是导致他们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认识当前的改革,不是把认知对象孤立起来,静止地考察其中的一枝一节,作单纯的价值判断,而是把当前的改革置于中国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态历程之中去作宏观的历史性考察,表现出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为揭示改革的本质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邓小平同志首先把当前的改革置于中国革命的历程之中去作动态性的考察,指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③我国的第一次革命是成功的,但第一次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邓小平同志不仅揭示了改革的历史背景,而且把它视为中国革命历程上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是对中国革命的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展。邓小平同志还深刻分析了当前改革与我国革命事业的历史命运的深刻联系。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上去了,国家实力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显示出来,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④

邓小平同志还把改革事业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之中去加以审视,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又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⑥邓小平同志不但把改革视为中国革命的继续,而且把它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改革同当年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终于夺取了革命胜利一样,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一场革命,是对一切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模式倾向的一种纠正,因此,这场改革不仅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

邓小平同志除了从改革与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之中去考察改革的性质之外,还从目的论的角度对当前这场改革的性质进行了分析。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共产主义以生产力的极高发展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为重要标志,因此,在分配形式上,共产主义能够按需分配。也就是说,贫穷根本不是共产主义,不注意提高生产力水平,不可能走向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

上说,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之后,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同时,他还天才地发现,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样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只有扫除这些障碍,生产力才可能得到进一步解放。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也就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⑧当前所进行的改革,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正相契合。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⑨“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⑩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认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以为用革命的暴力摧毁了反动的国家机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力也就获得了一劳永逸的解放。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因而必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不存在劳资冲突,人民当家作主,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任何障碍。正是这种认识使我们走上了闭关锁国、停滞不前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反复证明,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既有思想观念上的,也有体制上的。政治体制优越,并不等于管理体制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更不等于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上层建筑都不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不可能一劳永逸。这一认识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必须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也就否定了我国革命的大部分历史。但是,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⑪由此可见,用革命的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改变了人剥削人的旧的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可能没有任何障碍,为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而进行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那么,有哪些因素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分别从思想观念、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诸多侧面进行了分析,首先倡导解放思想,明确提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历史进步的尺度和评价是非功过的价值标准。但思想观念又不是万能的,介于思想观念和物质之间的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严重的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

须改革。这样一来，这场改革就是全面的、深刻的，不仅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也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和切身利益，因此，它是一场相当深刻的革命运动。

三

改革不是一个新名词，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改革，东欧和前苏联也曾大谈改革，当前，我国国内对改革也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不仅仅是着眼于它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也不仅仅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这一“终极目标”，而且是从政治方位对我国当前的改革进行了观察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不仅从政治角度概括了我国的改革事业的独特性，也为改革航船的胜利前进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革命”一词，原指变革天命。封建社会帝王为了神化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也就意味着天命变革。今人则多用“革命”一词来概括人类改造自然、社会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叫做“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叫做“社会革命”。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我国一些人的心目中，“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打倒”、“砸烂”，在这些人眼里，革命就是群众运动，就是游行示威，就是“破字当头”。邓小平同志首先纠正了这种错误观念，指出，改革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决不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⑨改革“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⑩由此可见，改革是对极“左”的否定，是拨乱反正。

那么，改革是不是“向右转”——放弃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呢？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⑪我们讲的改革与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政治方向不同：“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⑫邓小平同志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又讲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对于如何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基本点”，即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讲改革开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⑬。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共产主义社会以物质的极大丰富为标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功过得失的重要尺度和标准。但他并不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衡量社会制度的唯一标准，而是反复强调以“四个坚持”为发展生产力的前提，讲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理直气壮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改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既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的改革，也不同于“向右转”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它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著名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学习和领会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的性质,积极投身改革事业,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 释:

-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3、134、225、135、95、116、134—135、137、115、82、81—82、296—297、138—139、138页。
② 转引自韩仲民:《中国书籍纂史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

(责任编辑 叶娟丽)

(上接第43页)

要把人员精简同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通过精简,既改善机关人员结构,提高其素质,又使大批人才转移到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岗位上去,特别是到生产、服务和基层第一线去,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必须牢固树立机关富余人员不是“包袱”而是“财富”的观念,认真做好人员分流工作。有的可以随着专业经济部门改成经济实体,成建制地转为企业员工;有的可以鼓励和帮助他们走出机关兴办社会急需的第三产业;有的可以动员他们到基层去,到工商、税务、政法等需要加强的部门去。公务员制度建立起来,机关富余人员也有了“出路”,精兵简政的成果就能巩固。

注 释:

- ①⑦⑧⑨ 《江泽民与全国机构改革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7月24日第1版。
②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6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⑩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1993年11月17日第1版。

(责任编辑 叶娟丽)